

第一章 少年岁月

直到 1997 年有一次出差到无锡的机会，依靠几位无锡市体委同志的帮助，何振梁终于找寻到了他几十年前出生并居住过的那座房子，还重游了他童年时曾经十分熟悉的一些无锡故地，感到意外的惊喜。

以前振梁只知道自己是在 1929 年 12 月 29 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市郊区吴桥附近一个叫田屠里的地方。这次亏得找到了几位周围邻里的热心老人，靠这几位老人七拼八凑的回忆，终于找到了振梁家居住过的这座二层楼的房子。从前农村的房子是没有编号的，现在是吴桥黄巷乡田屠里 7 号。在当年周围全是平房的农村，这所稍有名气的何家租住的房子，曾经是村里最讲究的房子，现在已经残破不堪，摇摇欲坠 成为几户小店和居家。

许多童年时记忆中的印象都已改变。从前振梁家住房前面还有围墙和影壁，门外就是大片的桑林和稻田，出门走到那座木板桥面的吴桥脚下，就是曾经与振梁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源康丝厂。源康丝厂从抗战时起早已荡然无存，今天只有仍然生活在田屠里、年轻时曾经在源康丝厂工作过的几个老人还记得起这个名字。现在吴桥已经几度拓展为宽大的公路桥 桑林、稻田早已变成挨户接幢的新住宅楼和商店 田屠里 7 号这间挨在马路边的小破楼，肯定在不久以后也将被不断扩建的市区所淘汰。

被战争毁了的家

关于幼年时家庭里的许多事，振梁并不清楚或是记忆朦胧，多半是从家人那里听说来的。

虽然振梁生于、长于无锡，但他并不是真正的无锡人。他祖籍浙江上虞。据说他的曾祖父是地主兼营银钱业，因为抽鸦片，使家道败落。祖父经营药材业，还在青壮年时就去世了。当年是二十多岁的祖母靠纺纱织布把儿女二人拉扯大的。振梁的父亲何梦莲只念过私塾，经他姐夫家的介绍，16岁时就离家到宁波当学徒。后来上海的一家钱庄拜一个姓王的先生为师傅。

自从清末上海开埠后，江浙的许多商人一面在上海经营银行、钱庄，同时在江浙一带开设纺纱、织布、碾米、磨面、榨油、缫丝之类的工厂。无锡曾经是古代吴国都邑，有贯连南北各地的运河穿过城市，远在明、清时就已有甲于中国东南的米市、布码头和丝茧市场。民国初期浙江有个道台衔的大买办顾敬斋在无锡开设了家源康丝厂，需要个可靠的人去协理。何梦莲虽然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但他工作勤奋，为人谨慎，文理通顺，又写得一手好字，于是王师傅将他介绍给顾敬斋。何梦莲在26岁，1915年去无锡当上了源康丝厂的帐房，后来是总帐房，27岁时升任为经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复苏，国外对丝绸的需求增多，也推动了国内缫丝业的迅速发展。何梦莲把自己的命运与缫丝业紧密相连，走上了中国小工商业者艰难的发展道路。他苦心积累，逐渐在源康丝厂有了自己的股份，后来也开始自己创业。在他事业鼎盛的1928年时，曾一度参股拥有三家工厂：一家是他当经理的源康丝厂，另外自己开设了两家小厂，一家是用丝厂下脚料加工成出口用丝的小丝厂，还

有一家小纽扣厂。他还有了社会地位 担任过旅锡宁波甌兴同乡会的名誉会长。

何梦莲在 1919 年前后娶了源康丝厂一个姓周的缫丝女工作妻子，这个美丽柔顺的缫丝女工就是振梁的母亲。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妇女的地位，最初的户口本上一直只称她是周氏。上小学时，母亲告诉振梁 他大姨的名字叫金秀，二姨的名字叫银秀。于是振梁淘气地对母亲说：“那么你的名字该是铁秀了。”母亲笑出了声，却没有回答是还是不是。振梁临了也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名字叫甚么。后来上海登记户口时，要求每人都得有名字。这时上中学的振梁出了个主意，按照南方人的口音，把‘周氏’写成‘周如’。家里的人都说好。于是此后的户口簿上，母亲的正式名字成了周如。

何梦莲在外面经营，整天奔波，家事很少过问。周氏为何家前后一共生了四个女儿，三个儿子，她要照料一大群孩子。她的第二个儿子振梁在 1929 年出生时，正遇上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当时何梦莲操心的是源康丝厂严重开工不足，振梁的出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特别的喜悦。在这以后几年，家境每况愈下，父亲的两个小厂陆续倒闭。母亲的家务事忙不过来，许多时倒是最大的姐姐若瑛给了振梁慈母般的关怀照顾。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轰炸无锡，源康丝厂也被炸毁。这年冬天，全家逃难到无锡前州镇柘塘浜周氏的老家，分住在几个舅父家里。当时日军已侵占无锡，躲避在乡下也并不安全。振梁虽然还很幼小，但战争的烙印已深深铭刻在他的脑海里。他至今仍清楚记得日本飞机轰炸无锡俯冲时所发出的刺耳声音，侵略军下乡时乱放枪、枪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的声音。他也记得日本侵略军的士兵用枪托砸门要找花姑娘的情景。他更清楚记得，当年只要一听说有日寇下乡的信息，姐姐们就都惊慌地赶忙分别躲进坟地四周的茅草丛

里。风声过后姐姐们回家来时，她们细嫩手臂的上下全是茅草和荆棘划出的一道道血印。他幼小的心灵里还弄不清为什么国家会任人侵略、人民会任人欺凌。但那些触目惊心的情景是一些种子，后来随着振梁的成长而发展成他渴望祖国强大起来能与别的国家抗衡的执着追求。

1938年初，何家迁到上海，住在公共租界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同的帝国主义者将上海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他们在这种名为租界的地域里拥有各自的驻军、警察、法庭，实行殖民统治。当时上海有法租界和英、美等国合治的公共租界。由于侵华日军当时只占领中国的领土，所以住在帝国主义者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里比较安全些，可以避免日本侵略军野蛮的直接统治。当时但凡有点条件的中国人都逃难住到上海的租界里。日本军队侵占无锡后，组建了华中蚕丝公司，多次派人来上海，希望何梦莲出来担任公司负责人。但是何梦莲不愿意当汉奸，拒绝出任。

1938年秋，何梦莲又与人合办了一家有200部车的缫丝厂，但是不到半年就倒闭了。从前的源康丝厂有个出口到美国、法国的名牌产品，商标叫“七星”，商标上都有何梦莲的亲笔签名，表示郑重和信誉。这时他只能靠将商标出售给上海的丝厂，月得四、五百元维持家用。可是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连商标也出售无门，何家的财源完全断绝。1942年底，何梦莲只能回到无锡在老东家顾家的一个办事处工作。连年的劳累烦恼摧毁了何梦莲的健康，1945年他身患气喘、心脏病、高血压，已经病重。这时一个亲戚又骗走了他最后剩下的那部分财产，使他更受刺激，恼怒。终于在1946年4月中风去世。由于家境贫困，振梁的一个姐姐在抗战期间因病夭亡了。

何梦莲的一生是当年许多中小民族资本家的写照。他们有爱国心，想发展中国的实业，他们兢兢业业，一生劳碌，但是他们微弱的资

本经受不起打击 历经挣扎 终于挫败。日本帝国主义者毁了何梦莲毕生操持的事业 也促使了他的早逝。从振梁记事的时候起 抗日战争给他烙上了终生的印记 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尊严、生活的保障、家庭的安宁 都被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摧毁了。

困苦的学生生活

振梁 1935 年上源康丝厂的小学,1937 年因抗日战争中断学习,1938 年在上海继续读小学。后来振梁家搬到法租界,他转到离家近的中法学校就读。中法学校是法租界的公立学校,由天主教的耶稣会管理,向中国学生灌输法国的文化。学校包括从小学三年级的初级班到高中的高级班。它的教学内容与国内的学校很不相同,除了中国语文外的所有其它课,除少数低班的中国教员外,都是由法籍教士直接用法语上的,连中国的历史、地理教材都是法国人编写的。课程内容都是法国的和天主教的观点。教课的天主教士很专横,对学生管束极严,常常无理地体罚学生。学校也有吸引中国学生的地方,该校前三名的优秀生可以减免学费,毕业生也较容易在法租界的机构找到工作。

好学的振梁在中法学校上初级班时曾跳过三次班,每次刚跳级时成绩差些,在第二学期又赶上前三名,因此被免除过几次学费。振梁虽然悟性高,法文学得很好,但他更感兴趣的是祖国的文化。对于学校里唯一的中文课程——《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他学得十分专心。在中法学校的七年,为他日后的法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学校里的法国教士也想把品学兼优的振梁拉去信天主教,让他在放学之后去上教义课。第一个学期,振梁觉得教义课很有趣,因为讲的都是圣经上的故事,例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过红海,海水居然分开来让犹太人通过等等。

但是第二学期要进学校里的小教堂，并且要在圣像前下跪，振梁于是不再去上教义课，因为他认为向外国人下跪是他决不愿意做的事。他从内心深处，对中法学校使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人格尊严受到损伤的殖民主义教育怀有反感。许多学生都对法国教士恨之入骨，但是敢怒而不敢言。1945年上海发生了一次“反法”示威。这次示威是由于法国军舰私自载走了一名战犯而引起的，是当时所谓领导了抗战胜利的蒋介石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一场纷争。当时中法学校几乎全体学生都参加了“反法”的游行示威。振梁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当他高呼“打倒奴化教育”的口号时，感到自己是参加了一次中法学校的“法国大革命”，对当时第一次看到法国教士竟然无法对付学生，心中感到非常痛快。

振梁的父亲是旧社会主张父道尊严的那种人，不苟言笑。他常不在家，偶而在家时，家里气氛总很严肃，连孩子们也不敢嘻闹。父亲知道振梁这最小的孩子努力学习，认为他会有出息，但他从来不流露自己的感情。振梁14岁时得了急性阑尾炎，进医院动手术。当他从麻醉药中逐渐苏醒过来时，听到父亲正在同母亲讲，振梁这孩子最有出息，但愿老天保佑他不会出事。那是振梁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从父亲嘴里听到对他的夸奖。在经济艰难的家庭里，振梁的中小学岁月是在母亲的忧伤叹息声中度过的，母亲总教育他要好好学习，将来出人头地，替母亲争气。母亲和姐姐都疼爱振梁，在有限的条件下，他总是受到最多的照顾。从很小的年纪起，振梁就很懂事，他会默默地替亲人分忧。当年他没有甚么玩具，仅有的游戏是在地上打玻璃弹子、滚铁圈、掷铜板（铜板是旧中国价值相当于一分的硬币，以用铜板击中地上的另一个铜板为胜）或是在空地上踢小橡皮球。像其他男孩子一样，振梁也喜欢足球，但是买不起看球的门票，他常同别的孩子一起从竹篱笆的破洞里钻进去偷看。放暑假时，他也曾随哥哥振梓回无锡去看望父亲。父亲当时住在有钱的东家的“顾家花园”里，在那里时，常年在上海

海狭小局促住处的振梁就有机会可以在空旷的大花园里无拘无束地任意爬树、满处奔跑。从学生时代起 振梁最大的爱好是看书。他的阅读兴趣很广，能到手的甚么都读，从课余读武侠、传奇小说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到鲁迅的杂文 他都爱不释手。虽然在“洋”学堂念书，他却特别喜爱中国的古典诗词和历史，这个爱好伴随了他一生。

好不容易盼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振梁热切地盼望从此过上国泰民安的生活。但是家里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善。父亲依然穷困多病 整个社会上充满乌烟瘴气。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而人民则嗷嗷待哺。美国大兵取代了日本兵 到处胡作非为 欺侮百姓。振梁对抗战胜利后的幻想逐渐破灭。在哥哥和一些不满现实的同学的影响下，振梁逐渐产生了对国民党的不满。他在学校里参加同拥护国民党的同学辩论时事，也在墙报上写文章讽刺当时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但总的说 当时振梁的性格内向抑郁 他会常常对着长空遐想 或是默然观看窗外的雨丝，有时甚至还会莫名地独自流泪感伤。

父亲去世后，振梁一家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劣，家庭的担子落到了哥哥振梓身上。但是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靠与别人凑集少量资金经营股票 经济收入时有时无 很不稳定。家里常常要靠典当借贷变卖度日，有时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粮菜的着落何在。

追求革命真理

1946 年夏 振梁高中毕业。对他继续就读还是停学去学生意 家中也有过犹豫。因为家中急需多一个人挣钱养家。但是振梁一直功课很好 是个很有前途的孩子 是家中希望所在。这时正好振梁能得到也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的部分奖学金，于是家里决定尽量克服

困难 让振梁继续上大学。

振梁在震旦大学选读的是电机系，学了这个专业，毕业后可以到法租界的发电厂工作 生活有保障。解放前 流行‘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大学生活对振梁是新鲜、兴奋的。震旦大学有较好的教学、实验条件 虽然全部课程用法语讲授 但是对从中法学校升上来的振梁来说 并不困难。在入学的最初两年 振梁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因为要保证功课好才能得到助学金可以继续上学。但是助学金并不够解决全部费用问题，首先书籍和讲义费用就非常昂贵。为了省钱 振梁常常只买最必要的讲义 有时甚至连讲义也买不起 只能靠听课时记笔记、借同学的讲义和书籍来抄录等办法来弥补。即使这样，家里仍然要不时变卖东西来支付他的饭费或其它费用。当时由于法国天主教的严格控制，震旦大学进步学运的力量与别的大学相比，比较弱小，只有少数震旦的学生参加了上海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1948 年下半年 解放战争发展很快 国民党的垮台已成定局 许多人对第三条路线的幻想也破灭了。地下党的力量在震旦有了发展。这时，振梁家经济困顿的情况更加严重，振梁也开始与进步同学有了较多的接触。在进步同学的带动下 他读了《观察》等反映小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杂志《交大生活》、《学生报》、《革命人生观》等进步书刊以及描述解放区生活情况的《延安纪行》等书籍。他逐渐清楚地懂得必须跟着共产党走，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道理，并且向往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民主进步的解放区。1949 年 3 月 振梁参加了地下学联震旦小组。当时蒋介石政权面临垮台前夕，上海当局的汤恩伯在作最后疯狂挣扎 镇压得很厉害。街头到处挂着甚么“凡是通匪、隐藏不报者格杀勿论”的大标语。身上携带进步书刊也很危险 搞不好被发现就会被认为是通匪，会招来杀身之祸。振梁当时知道地下学联是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所以在参加这个小组时，他激动地认为自己是在参加推翻蒋

介石政权的革命。同年 4 月，振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上海人民保安队 组织宣传学习、进行调查、为迎接解放作思想和具体组织准备等。当时他们按照分配，对自己负责地段的各个里弄环境进行调查，调查出入地形、当地黑社会分子及敌特分子情况并写出报告。振梁所分配的地段有个广播电台，他不仅要调查电台附近情况，在上海刚解放时还曾短期参加了广播电台的看管工作。上海解放前夕 人民保安队护厂护校 保护重要设施 防止敌人在最后关头进行破坏。参加这些活动也要有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也有一些进步学生在黎明前的最后黑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盼到了上海解放

5 月 24 日晚上 盼望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进入上海。天亮啦！振梁家当时在沪西区愚园路地丰里，沪西区是上海最早被解放的城区。那个晚上 他兴奋地整夜守在窗前 听着外面疏落的枪声 偶尔还能看见沿着愚园路向前推进的解放军的身影。天一亮他就骑上借来的自行车赶忙到学校去报告上海解放的喜讯。当时街上行人不多，因为市中心还有战斗。但是一些大胆的市民已走出来看望淋着雨、沿着马路休息、对民众秋毫无犯的解放军队伍了。他赶到震旦大学 学校所在区也已经解放 学校门前已挂出了“庆祝解放”的大字标语。马上大伙儿就忙于组织慰问解放军的活动。一连许多天，人们都为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忙得不亦乐乎，沉醉在无边无际的欢乐里。振梁索性住到学校里，可以夜以继日地参加各种工作和活动。游行的队伍需要有大幅的招贴画，从来未学过画的振梁对照着报上的图画把它描摹下来。工学院自己出了份《新震旦报》的油印小报 振梁学会了刻钢板、写仿宋体字 还学会写标题用的空心宋体字 弄点装饰图案。从来就腼腆文

静的振梁还上街头扭秧歌、打腰鼓、放声歌唱。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了多少年的上海解放了，许多人也彻底变了样，振梁是其中之一。

上海解放后，新事物每天大量从四面八方涌来，整个社会进行着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振梁像条久处于枯泽突然跳入了大海的小鱼，大口大口地吸收吞咽这周围一切新鲜的事物，每天都那么兴奋。他一变过去忧郁、内向的性格，热情地参加解放后的历次社会运动。1949年10月，震旦大学开始建团学习，他第一批参加了青年团，担任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1950年初，在震旦大学的地下党公开大会上，他表达了要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1950年4月，由于解放后开展大量外事活动的需要，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到上海调外语干部。法语的青年干部只能到专长法语的震旦大学去找，而当时学校里够条件的人并不多。团支书找振梁谈话，希望振梁能服从工作需要去北京。这次谈话虽然有些突然，但并不使振梁感到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批又一批学生参加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等等跟随解放军去解放南方和大西南。但是振梁毕竟离开毕业只有一、二个月了，他已经在作一个发电厂的毕业设计，何况家里的经济情况在解放初期更加困难，早就期望他毕业后能找份工作养家，而且他知道参加革命工作则只有供给制待遇，没法供养母亲和姐妹。但是他懂得作为一个团员，作为一个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他应该服从组织。而且到北京去，到党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去工作的前景极有力地吸引着他。于是他很快就答应了团支部，并且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家里。家里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母亲舍不得自己最喜爱的幼子远离家门，姐姐和哥哥担心一向需要人照顾的弟弟能否独自去闯天下，只有妹妹还年轻插不上嘴。但是他们最终拗不过振梁的决心，而匆匆为振梁的远离准备行装。所谓行装也只是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个破旧小皮箱，里面装上几件替换衣服。离开上海那一天，天下着

雨 淅淅沥沥地。母亲、哥嫂、姐姐妹妹全都去车站送行。他们都不知道何时会重逢，个个泪流满脸，而振梁却强忍着惜别的眼泪，勉强地装出笑容与家人告别。就这样振梁来到了北京，进入了革命大熔炉。

第二章 崭新的天地

振梁在 1950 年 4 月从上海的震旦大学直接调到了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从挤住在上海这个大城市一个小小角落的家来到祖国首都的革命大家庭，特别来到了从事青年工作的中央机关，对振梁来说，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新鲜。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新的需要学习的知识，每天都发生那么多令人兴奋激动的事物，时间好像总不够用似的。从前看上海的天空，老是灰蒙蒙、雨绵绵的，而北京的天空总是那么晴朗也显得特别蓝。上海人口密集，走到那里都是拥来挤去的人，喧闹不已，而北京则是一片宁静庄严。虽然那时的长安街到处坑坑洼洼，一上街就满脸尘土，市容也显得土气，但是首都北京那种充满朝气的政治气氛，就像最强的磁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特别是像振梁那样走上革命工作岗位的青年人。

在青年团中央

当时青年团的全名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所在地在满清政府时期属于名叫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这里周围环境很安静，没有杂乱的行人和商店，马路两旁是高大的槐树。团中央前面是一条小溪流，据说是同紫禁城前面的金水河是相通的，所以叫御河，河上面还架了一顶小桥，叫御河桥，而团中央的地址就叫御河桥 3 号。五十年代小溪被填平，改修成马路，地名也改成正义路。团中央离天安门很近，才一站

地,下班后大家常散步到天安门,在蓝天、红墙、黄瓦、绿树这片气派宏伟的景色前流连。

团中央机关所在地是原属日本使馆的兵营。办公地点除了一个工字楼外,还有四排两层办公兼杂用的房子。有的房间的墙壁上还钉有比大妈指还粗的大铁环,有点怕人,不知道当年是日本人拴犯人还是拴军马用的。团中央隔壁的中苏友好协会是从前的日本使馆,日本人策动末代皇帝溥仪当伪满皇帝时,在那里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现在则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团中央的对面是占地面积很大的英国大使馆,以前是座王府。1956年为了抗议英、法在埃及制造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北京市数以十万计的群众曾经接连好几天在英国使馆周围示威,写有抗议口号的三角小纸旗被愤怒的人们扔过高高的围墙,在使馆院内堆成厚厚的一层。现在这地方早已成了公安部。

振梁来到团中央机关报到后,先是由国际部一个同志进行了简单的口试,以后就正式上班了。那时候机关干部实行供给制,参加革命工作是自觉、光荣的事,谁都以苦为乐。刚到机关也有过令人尴尬的时刻,当时谁都是一身灰布制服,只有振梁他们几个刚从上海调来的大学生穿着旧西服,与周围环境非常不协调,进来出去大家都好奇地盯着他们看,够别扭的。好容易熬到给他们发了新制服,他们赶紧换上。那时一年发两次制服,冬天发棉袄,夏天发单衣,春暖时大家把棉袄里面的棉花掏掉当夹衣穿。制服里面则是各人原有的五花八门的衣服。大家衣着随便,谁也不讲究式样。团中央的食堂是院子里一个铁皮屋顶的大木棚,吃饭管饱,不用交伙食费,吃的是窝头、高粱米饭、酱疙瘩、熬白菜萝卜,偶尔有红烧肉加土豆,每个月可以改善一次伙食,叫做打牙祭。每个季度才能有只够购买日用卫生用品的几块钱,好在大家要求不高,这点钱好像也够花。当时大家穷得开心,时不时还能一起凑钱买些花生米吃,偶而还能几人一伙上小摊吃碗馄饨解解馋。

团中央机关的干部宿舍在王府井南口叫做“东长安街17号”的一座四、五层楼房，可能曾经是个小旅社之类，1950年时门口地面上还有“卡尔顿 Carlton”英文字样的水磨石地砖。宿舍门前就是长安街。那时的长安街街心还有不少垃圾堆，马路是以后才拓宽的。文革后这所房子拆除，后来开设了“麦当劳”快餐店，现在已经再次被推倒盖成东方广场了。当年这座宿舍房子已很破旧，人在木楼梯上下时轧吱轧吱作响。每层楼有六、七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放三、四块铺板。用两条长木凳架起铺板，就是每人的床，每人的脸盆、衣包、书籍放在自己的铺下。每个房间只有一张三屉桌供大家放漱口缸、茶杯用。每人的铺板加张小马扎就是书桌。那时的宿舍真是名副其实的只供睡觉用的地方，大家都爱从早到晚待在办公室里，连星期天也如此。振梁每天一清早起来，用冷水抹把脸、刷刷牙就到了机关。

机关的集体生活实在太丰富多彩了。这个革命大家庭温暖亲切，处处使振梁深受教育。当时机关人数不多，人们都互相认识。团中央的领导大都是参加青运、学运多年的同志，第一书记冯文彬是解放区的青委书记，书记蒋南翔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荣高棠最初是团中央的秘书长，后来升为书记。最初团中央书记廖承志还兼任国际部部长。廖承志身兼多职，他不仅是和大、侨委等单位的领导，还是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他总是在坐汽车时也办公。在工作接触中，振梁对这些领导的为人随和、毫无架子很感意外。好些人都用廖承志同志的小名“小廖”称呼他，他毫不介意。工作间隙时，国际部两位胖乎乎的正副部长廖承志和区棠亮，偶尔也忙里偷闲打上两下子乒乓。在机关里，不管是团中央书记还是刚调来的小干部，彼此都以同志相称，显示了革命队伍里特有的亲切情谊。这个习惯振梁保留了终生，虽然后来几十年振梁在政府机关工作，只能逐渐适应以职务相称的做法，对有些较生疏的同志，称呼其职务，但振梁仍喜欢别人称他为同志，或老何。

直到今天，只要是与老同志相聚，就总是直呼其名或者为了表示尊重加上同志二字。

青年团中央是中共中央的直属单位，当年举行一些大型活动时，往往把团中央干部的位置安排在前面，能够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等等中央领导同志。这种时候能令人感受到一些平日敬爱的中央领导同志离自己并不遥远，他们与群众保持着鱼水般的密切联系。刚到机关不久，振梁作为工作人员，在怀仁堂的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上，见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这是他第一次在那么近的距离见到他敬爱的毛主席，他感到无比幸福。1950年国庆一周年的庆祝大会，振梁是陪同外宾观礼的翻译，也荣幸地得到了印有国徽、由毛泽东署名的请帖。这份珍贵的请帖成了振梁的宝贝。1950年10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任弼时同志的追悼会。任弼时同志生前是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央青委书记。追悼会上，团中央干部站在最前面，主持大会的刘少奇同志就站在几米之外。1951年7月1日，在先农坛举行建党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当天下着倾盆大雨，团中央的干部与中央领导同志站的位置离得很近，整个开会过程中，大家全都是浑身湿透，很感亲切。

机关的业余生活很活跃。每天晚饭以后，大伙儿各忙各的。有人到院外，特别是到天安门散步。有人打篮球、排球。有一次，团中央国际部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干部举行足球友谊比赛，振梁也上了场。国际部居然踢赢了体总，一时成为美谈。晚饭后还常有歌咏活动。振梁在学校时从来没有上过音乐课，连简谱都认不好，更不认识五线谱了。但通过歌咏活动，振梁学会了許多至今未忘记的苏联歌曲和革命歌曲，大伙还发掘了振梁这个还不错的男中音。当时青年艺术剧院是团中央的下属单位，他们的演出场所青年宫每个星期六举行舞会。因此每逢周末，团中央干部成群地上青年宫去跳舞。舞会气氛随便热闹，不会跳也没

关系 与谁跳都行。有时周总理也来青年宫跳舞。振梁当时是个积极分子 几乎什么活动都有他的份。他也是在那时学会跳舞的。

每年的“五 一”、“十 一”天安门前都举行群众性大游行 机关的队伍大清早就集合出发到南长街等候，队伍过了天安门后，从六部口走回机关。然后晚上大家又成群结队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联欢。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很小，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土，但是大家高兴地拉着圈子跳一晚上集体舞。1952年的“五 一”节 晚上下起小雨 大家毫不在乎，几个人合顶一块雨布照样到天安门联欢去了。那些年代的联欢也真是谁都可以同别人联欢，广场里是数不清的自发形成的小圈子在唱歌跳舞不停，毫不相干的人愿意加入到自己所在的圈子里来也欢迎，自己想要参加到别人的圈子里去也没问题。那是青春活跃的岁月，那是友谊欢乐的岁月！

当年机关里学习的空气很浓，没有谁是吃了晚饭就回家的，连国际联络部的女副部长区棠亮，虽然家里有待照顾的小娃娃，晚上仍常常回办公室来。除了机关组织的时事、政治学习外 国际部另外组织外语学习 除了每人的第一外语学习外 还组织、鼓励干部学习第二、第三种外语。振梁除了提高自己的法语外，参加了部里组织的俄语学习，再结合作业，自学了英语。各人定有各自的学习计划。当年每天晚上，机关各个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国际部的灯更是熄得最晚。振梁他们总是学习到临睡觉才摸黑回宿舍钻被窝。振梁从学校、家庭的小天地来到团中央这个高层领导机关、来到优秀人才济济的革命大熔炉，经历了一场改天换地的飞跃变化。他非常热爱这个革命集体，离开上海前，他对远离家人独自到北方陌生的环境里去闯还有点担心，这些多余的顾虑早就一扫而光。他像是从黑古隆冬的狭小胡同里走出来，突然处身在宽广明亮、目不暇接的新世界里 他恨不能增加几倍、几十倍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拥抱这一切。每天他都过得很充实 并且计划

着要过得更加充实。在团中央，他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广泛学习国际形势和时事。结合工作，他学到的更多。

许多个第一次

在团中央工作的两年八个月里，振梁经历了他年青生命里的许多个第一次。

振梁调团中央后，1950年4月份参加了接待法国劳动青年联合会总书记雷奥·斐盖尔（Leo Figueré）的翻译工作。当时斐盖尔是结束秘密访问越南后路过北京。这是振梁第一次当翻译，尽管他在学校里学过多年法语，但是课本里的语言与工作中的大不一样。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大量词汇的法语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以前他只知道“同学”这个词，现在才懂得原来法语里的“同志”也是这同一个词。斐盖尔同情支持越南人民，将法国的侵越战争称为“肮脏的战争”，也使振梁懂得国际主义并不是一句空话。

平日除了正规的政治、外文学习外，振梁也结合阅读整理国外青年运动资料，积累国际知识的材料。在这个宽阔的知识海洋里，他学到了许多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学问，如什么在匈牙利搞反动破坏活动的霍蒂斯分子、二次大战时追随纳粹的挪威傀儡吉斯林等等。

5月初，以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米哈伊洛夫（Mihailov）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率领了庞大的文工团访问中国，对中国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表示热烈支持。那次不懂俄语的振梁干的只是后勤服务工作，包括为笔译人员打打开水之类。但他干得很来劲，并不因为自己是大学生干了打杂事情觉得委屈，因为那些年月谁都为自己能为革命工作出力高兴，谁都不斤斤计较。因为列宁教导过，革命是从做小事情开始的。

这年的9月到11月，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团中央接待了由十几